

来自浙江的法治好声音

本报特派记者 王索妮



设立杭州网络法院 推动网络强国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 齐奇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必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杭州是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重地。我建议,在杭州设立网络法院试点,将部分典型的涉网案件从现有审判体系中剥离出来,实现网络审判专业化、诉讼流程在线化、系统应用智能化、司法服务便捷化、纠纷解决多元化,构建专业、高效、便捷的网络司法服务体系,推动网络强国建设。

司法出清僵尸企业大有可为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民建副主任 车晓端

处置僵尸企业、积极推动落实去产能任务,是有效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也是司法大有可为的领域。应当积极发挥审判职能,结合本地经济结构实际,因案施策,灵活运用破产重整、破产清算等多种手段,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破产审判道路。过去一年,绍兴在市场化、法治化出清“僵尸企业”中做了有益的尝试,比如对“僵尸企业”加强分类指导,建立健全优胜劣汰机制,通过兼并重组、债务重组乃至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关停产能落后企业,整治“低小散”等。今年4月,“中国破产法论坛——管理人制度的实践与创新专题研讨会”将在绍兴召开,希望迸发出更多更优秀的司法智慧为全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助燃之力。

大数据时代 防灾减灾信息要共享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晚报副职协理员 郑雪君

目前,灾害应急信息如监测、灾情、人口分布、承灾抗灾能力、应急救援力量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机构,决策者较难作出全面科学的判断。同时,各部门相互职责的交叉性,一定程度上又造成政府资源的浪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部门间数据共享和分析、全面有效决策迎来机遇。我建议从国家层面组织建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防灾减灾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实现气象、民政、水文、国土等多部门的基础信息共享,提高政府应急管理水平和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

身在基层心忧国 女代表的履职风采

新华社

身在基层心忧国,履职议政显风流。“三八”妇女节前夕,记者走进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次会议的代表驻地,采访了几位来自基层的女代表。她们带着百姓的心愿从基层走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其他2000多位代表一起履行庄严的职责,共商国家大事。

陈腊英: 环卫工人代表的“环保议政”

“从没想到一个环卫工人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既然选我了,我就要多为工友们说话,让更多的人关心环保事业。”陈腊英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陈腊英仍在杭州市环境集团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发展分公司当环卫工人,并多次提交与垃圾处置、环境保护相关的建议。“城市扩大,消费提升,垃圾越来越多,很多城市面临‘垃圾围城’的难题。”陈腊英说,“如今,老百姓对环保事业的重视程度与我们面临的‘垃圾难题’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陈腊英不断寻求解决之策。她曾在建议中提出,实行垃圾减量指标考核,通过立法促进城市生活垃圾的减少。她还提出,美丽中国要从环境教育抓起,让群众了解垃圾分类的方法和益处。今年,陈腊英提的建议仍与垃圾分类有关。她建议加快设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垃圾事业’大有可为,但需要每一个人共同参与。”陈腊英说。

黄月芳: “民情日记”记录农民呼声

黄月芳不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一个大红笔记本,里边记录着家乡农民的建议,她说这是她的“民情日记”。来北京后,在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海南代表团驻地,她用这个大红笔记本记录自己点点滴滴的感受。作为一名从海南中部地区五指山黎族乡村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今年50岁的黄月芳十分珍惜自己履职的日子。今年2月28日,刚刚开完海南“两会”,她就连夜赶回家乡继续走村访户,征求民意。黄月芳调研发现,在海南中部地区核心生态保护区内,人多地少,农业种植空间十分有限,保护生态与农业开发矛盾突出,仅靠目前的生态补偿远远不够。“第一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提的是实施生态核心区补偿的建议,山区群众为保护生态作出贡献,应当获得相应补偿。”黄月芳说,五指山市从2014年开始,对全市农民发放生态直接补贴,每人每年可以领到400多元。其他中部山区市县也出台了相应的生态效益补偿政策,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今年,我的建议是国家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加大补偿力度。”黄月芳说:“我来自基层,带着农民的呼声来,就要在会上为百姓说话。”

潘成英: 把大凉山的春天告诉北京

潘成英特意带了一套绿色的彝族服装来北京。“绿色象征着春天,我要穿着它走进人民大会堂,把大凉山的春天告诉北京。”大凉山地区,沟壑纵横、山路曲折。自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喜洋洋、美洋洋双语幼儿园董事长潘成英很多时间都是行走在田野乡间,就民族地区教育、交通等进行调研,提出建议。她说,听民意、写建议、看落实,是人民代表应尽之责。两会召开前,潘成英走进喜德县则约乡中心学校。在这里,很多娃娃寄宿在学校,床铺紧张。“在凉山州,寄宿制学校都存在这样的情况。”潘成英说,今年,她将就加大发展寄宿制教育提出建议。2015年,潘成英提出加大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建议。目前,“一村一幼”计划已在大凉山全面铺开。她提出增开民族地区火车客运列车的建议。如今,这个建议也已经变成现实。“在凉山州甘洛县,增停了三列火车。”潘成英的很多建议已变成现实,她感到,每个人都在推动社会进步。

记者问:“最多跑一次”真能做到? 省长答:有条件、有能力,一定能!



记者现场向浙江代表团提问



媒体长枪短炮聚焦浙江代表团
本报特派记者 王索妮 摄



新华社 金立旺 摄

(上接1版)
车俊说,浙江政府的自身改革,第一阶段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第二阶段是“四张清单一张网”,第三阶段便是更高层次——“最多跑一次”。这样提,正是要让老百姓和企业有更多的获得感,“用老百姓的语言来代表我们自身改革的深化”。怎么实现?车俊补充说,当然不是空口说大话。首先,浙江有工作基础,前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特别是“四张清单一张网”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次,浙江有政务网和大数据等技术支撑,“正因为有这个平台和网络技术的支撑,我们才提出‘最多跑一次’”。

因为有了流程再造,车俊现场勾勒出一幅蓝图:今后老百姓去窗口办事,在出发前便在网上知晓办这件事需要什么资料,一次性带齐;到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只要去一个窗口,即使涉及多个部门,也是到一个窗口,由首办单位一次性受理,内部后台进行转递;事情办好后可以坐等相关材料通过网络或是用快递的方式送达到自己手上。“最多跑一次”,意思是让政府跑、部门跑,不让群众跑、企业跑。“再加上严格的制度保障,我想,对于‘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有条件实现、有能力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话音未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7054423

警鐘 反对邪教 共建平安

